



凤凰卫视
凤凰书品

世纪大讲堂

中国的困惑

王鲁湘

怎样为沙地上的城堡筑实基础？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纪大讲堂

中国的困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困惑 /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613-5165-9

I. ①中… II. ①凤… III. ①改革开放—研究—中国
IV. ①D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6808号

图书代号: SK10N0428

上架建议: 畅销书·大众文化

中国的困惑

编 者: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周 宏

文稿编辑: Nina 孟 迷

封面设计: 星银河书装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5165-9

定 价: 28.00元

目录

序 | 于热闹处安静听 / 001

陈志武 | 经济模式再思考 / 005

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GDP增长速度差不多只有官方公布的一半左右。真正全民所有制之下的大家都应该有的那一部分好处，老百姓是不怎么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

盛 洪 | 追寻流失的租金 / 021

将属于全体人民的自然资源产权交给一部分人使用和经营，既不上交租金也不上交利润，实际上是让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全体人民的租金利益。

李炜光 | 税改的设计思维 / 039

中国的税在法之上，而不在法之下。这些年我国税收的增长越来越快，但是民众享受的福利却没有随之得到明显改善。

黎友焕 | 热钱与经济安全 / 057

中国的股市、房产和敏感性商品的价格波动曲线，与热钱流入中国的波动曲线高度吻合。大批热钱游荡在中国，会扰乱市场行为，增加通胀压力，威胁经济和金融安全。

郑永年 | 民主的现实考量/075

把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提倡的人和反对把民主看成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是同一种逻辑，那就是把民主看成是西方的东西，这并不符合历史现实。

王人博 | 宪政百年反思/095

严复说，不宪政，无富强；胡适说，不宪政，无文明。即便宪政跟富强关系不大，我们也应该追求宪政，因为那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道德标尺。

毛寿龙 | 大部制改革思路/109

我国的政治体制在特别关心某件事的时候，高度集权于高层部门；不关心某件事的时候，又都高度散权于一线部门。

迟福林 |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127

如果能把惠及十三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好，也就解决了未来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在动力问题。

王卫国 | 土改的人文关怀/141

土地立法看起来是管理土地，实际上是调节人与之间的关系。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心中只有土地，缺乏对人的关怀。

沈 丹 | 把脉城市拆迁/157

中国人过去见面习惯说“吃了没？吃了”，现在见面说“拆了没？拆了”，要是碰上政府官员，还会进一步问“拆哪儿”？好像中国大地上已经没什么可拆的了。

张 鸣 | 城市化与农民出路/175

城市化其实不是政府的意愿，不是某些学者的意愿，更不是某些团体的意愿，而是农民自己的意愿。政府与其投钱为农民工建设新农村，不如在城里盖点廉租房，替他们稍作安置。

王思斌 | 农村新社保困局/191

农村的老年人为国家、为农村、为儿女奋斗了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最后他们的归宿会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吗？

何裕民 | 什么是好的医学 / 207

我们把医学这个概念异化了，把医学看成就是治病，治病就是高科技，最后成本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先进，但是失去了人性。

李 玲 | 新医改回归公益性 / 227

有学者认为，政府就该管付不起医药费的人，付得起的就不要管了。这个方法为什么在中国不可行？因为中国付不起的人太多太多了。

朱永新 |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 245

当前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忘了什么是教育。教育本该是幸福的、快乐的，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升学考试，而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

杨东平 | 教育的文化更新 / 265

教育的文化更新有两大对立物，一是传承千年的“读书做官，唯书唯上”的思想，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模式。

序 于热闹处安静听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于2000年开讲，至今已有五百多位演讲者登台，四位主持人接力主持，千余学生现场听讲提问，亿万电视观众一起跟堂收看——这些数字都体现出一种坚守：我们的民族和文化，需要更多学术殿堂独立思想的浸润和引悟。

当年我们创立这档节目时，找不到另外的成功范本，对于它后来的影响力，我们以为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其实它又潜藏着必然的因子。

把大中华文化圈知名学者的最新学术思想成果，从小众范畴搬进国民大课堂，是方法，也是态度。这个课堂没有任何偏见，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于是，相对静态的演讲，被传播放大，而思想的厚重，又随了传播远走，中华文明的高山流水，惠泽于四野。

如果说生命个体原本是有限的常数，不可估限的变量正在于她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和路径。对于主讲者和聆听者都是如此。

不论是一桶水浓缩为几滴水的台上智慧，还是从几滴水中学悟一桶水的普通听众，他们在讲堂相遇，都应是生命的盛事。在当今社会的躁动喧嚣中，静心倾听一堂知性的课，或许是一件奢侈的事，可它切实地拓展着人的眼光和胸襟。时代敬重毕其一生苦心求索的大学问家，也敬重那些崇尚知识和品质的莘莘学子。这些交流，是述者的知识之光数十年聚能的一朝发散，也是听者的人生阅读的一次循道捷径。

生命的个体往往渺小，不可估量的变量时刻影响着生命的流向与路径。我们都是从原点出发，像螺旋线一样盘旋着向上或向下，感悟着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大师的现场讲演也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读书的方式与他们作智慧的交流。一本书 一个午后，一杯清茶，或斜依窗前，或枯坐树下，随着书页刷刷翻过的声音，一种高远的快意漫过流动的生命。

从青涩到成熟，从学习包容到提升自信，如同春闹枝头，繁花待放。中国正在努力担负大国的责任，中国人正在跨越“百年民族悲情”年代，从敏

感、激愤、“输不起”，到宽容、理解、承担，“具备了大国国民应有的自信和平常心”。一种开阔雄放的视野在民众之中悄然站定。《世纪大讲堂》想告诉人们，只有持续开放的意识、不间断地开放脚步、不停顿地向自己的内心和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找，才可以触摸到那个叫做进步的东西，才可以有一种丰满的人生。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

刘长乐

经济模式再思考

陈志武

陈志武，1953年生，福州人。1986年赴美留学，放弃了攻读七年的计算机专业，转学经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著有《金融的逻辑》《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等。

“国富民穷”的局面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最大瓶颈。

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 GDP 增长速度差不多只有官方公布的一半左右，因为资产升值对民间消费带来影响的渠道被国有制堵死了。

真正全民所有制之下大家都应该有的那一部分好处，老百姓是不怎么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

王鲁湘：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公布了十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人民币。这种大手笔的财政支出是否能帮助中国渡过金融难关？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有关这些问题，请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为我们解答。

陈教授，您对这次4万亿的投资怎么看？

陈志武：4万亿的投资，我个人觉得尽管用意是很好的，但从效果上说可能不会像我们预期或希望的那么好。

王鲁湘：前不久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您一篇文章，您提出一个大胆建议，就是把一批本来应该还给老百姓的钱拿出来建立基金。您怎么会提出这个设想呢？

陈志武：我那篇文章大概意思是说，我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国有化一直到现在，都是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来做的。把所有的私人财产包括楼房，全部归为公有，然后归为国有，最终建立起一个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体系。但实际上五十几年下来，真正全民所有制之下大家都应该有的那一部

分好处，老百姓是不怎么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

王鲁湘：我活了五十多岁，就从来没感觉到全民所有，我觉得那就是国有，跟全民没关系。

陈志武：按照我收集的数据计算，你应该有差不多5万到6万人民币的财富。但是这6万块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没有到老百姓手上，所以并没有对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产生实质性后果。全民所有制必须通过民有化改革，把这些财产最终的产权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个人身上。否则，大家现在都希望发生的所谓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很难实现的。

王鲁湘：政府这一次仍然采取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不是也有某种现实考虑？比如我听到一些解释，说这些大型项目的投资能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能形成一个更长的产业链，是这样的吗？

陈志武：不是这样子。从绝对角度讲，我花4万亿，多少都会给GDP带来贡献，肯定不会等于零。但如果换一种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我现在提的一个建议，给全国所有中小企业免税一年——中小企业给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在46%左右，同时给中低收入的家庭和个人免税一年，这两项加一起大概会节省3万亿左右的税钱。这3万亿如果由中小企业去做投资——不是由政府官员去投，中小企业站在行业的前线，更知道拿没交税的钱去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回报，由此产生的就业效果、产业结构优化效果、GDP新增效果是非常巨大的，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模式更多地转向内需型消费，也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帮助。

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这个话题有点太大了，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定义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要讲的模式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老百姓不太敢消费

第一，中国的老百姓不太喜欢消费，不太敢消费，所以中国国内的民间消费总是上不去。

第二，国家是花钱和投资的主体。换句话说，老百姓一般是不花钱的，更多是把钱存进银行。而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通过银行对金融资源的控制，通过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控制生产——尽管从数量上不一定像原来那么多，特别是通过国有制让几乎所有的土地直接或间接地都属于国家，由此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资产，这就为所谓的投资驱动模式提供了基础。

第三，产品消费主要依赖出口市场。一方面民间消费不足，老百姓都不愿意花钱，另一方面国家在大的工业基地方面不断投入，使得工业产能越来越高，由此带来供需两者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实际上这种不平衡在过去三十年变得越来越严重，生产这么多东西往哪儿卖呢？好就好在有出口市场。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越来越高，没问题，靠出口！国外的出口市场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一个最核心也最必要的条件。不过金融危机一来，这个条件就变成了一个大问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对于进一步经济增长要想那么多办法，想让中国突破这个局面。

目前这个情况可能是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一次挑战。我想谈的是为什么7%-8%的GDP增长速度对于中国来说好像显得不够。对于西方人，对于那些习惯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人来说，他们抓破脑袋也不能理解，7%-8%的GDP增长速度还不够吗？可是对于中国来说，如果

GDP 增长速度降到了 6% 或 5%，就会出问题。因为中国整个的经济制度架构安排，使得它的 GDP 增长速度不能够跟其他私有制经济做直接的比较。

接着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增长模式在过去三十年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原因大致来说有两个：一是经过二百多年工业革命的发展，到 1978 年，那么多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不管是交通运输技术也好，电脑技术也好，其他的运输容量、生产容量也好，都等在了中国的大门口。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中国只要愿意开放，愿意加入全球贸易秩序，同时也愿意引进这些技术，所谓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很快地体现出来。

第二个成功原因是国家对资源的垄断。这种垄断在一定时期对经济发展有正面的贡献。比如我们把中国、印度和美国做一个比较，美国是自由市场国家，是私有制国家，它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美国尽管没有国家拥有的资产，总统没有办法通过签署一个命令把老百姓的私人财产调动起来，比如调动 4 万个亿去盖大楼、建奥运场馆、盖国家大剧院或者修更多的高速公路，但是没关系，美国在私有制之下可以把民间的资源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调配到一起，做一些大项目、大企业，比如 GE、微软这样的大公司。

中国没有美国这么发达的资本市场，但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土地、生产性资源及资本储蓄，只要国家发改委或当年的计委，或者国务院哪个部门发一个文件，就可以把这些资源重新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去调配，而不需要支付其他司法方面的成本或者要经过国会长时间的听证，所以资源调配起来可以非常快。

印度正好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印度是私有制国家，政府要做大的形象工程或者工业基地，像武钢、宝钢、三峡这样大的工程，是很难调配资源的。因为政府不能够命令老百姓把自己的土地财产放弃掉，把属于他们的钱、他们的房子奉献给国家，政府没有这种权力。同时印度又没有一个很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在工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确实实赶不上中国。